



康巴周末

康藏人文

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格扎

隐藏在残碑背后的神秘往事

(上接第五版)

甚至对“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一茶联的由来，他们也进行了考证。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要得到一杯上等好茶，必须具备两样东西：‘蒙山顶上茶，扬子江中水’。现在，四川人去蒙山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就住在长江周围。经常有人问我是否在旅途中遇到过这条河流，这似乎很荒唐。对长江名字的起源以及适用范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对此我们搁置不予讨论。但显然为此而研究这条普通的河流没有意义。那么在哪里能够找到扬子江中水呢？我冒昧地以自己的回忆来分析，或许可以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我对好茶极为沉迷。在上海居住的时候，我有机会拜访了这个城市的地方官员。这名官员向我讲述了好水对泡出好茶的重要性，并告诉我他只使用扬子江中水泡茶，而从来不用其他水。我问他从哪里得到这种水，他告诉我每天从镇江由轮船运来的。有一次我去了镇江，碰巧通过一个小岛分开了。当时我看到许多小船驶入深水中，船员们把他们的水桶灌满，然后返回到岸上。经过询问，我才得知在水底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泉水。那里曾经河水干枯，河床外露，这泉水才被人们所知晓。我已经记不清这泉水了，但据说是该泉之畔有一块石碑，上面有对此泉水的记载。但当长江淹没旧址时，石碑就被转移到了一个更远的泉水旁边了。这款新的泉水同样具有原泉水的优良品质，声誉很好；但那些熟悉这里泉水历史的人却依然执着，他们泡茶时仍然去取泉水。”

此外，许多肩负着政治、经济等各色任务的“间谍”、探险家、植物学家们纷纷来到中国内地，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各种手段，破解雅安砖茶的“谜团”。罗森和哈奇森先后写出了《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四川任务报告》等考察报告，为印茶入藏提供了决策依据。其中《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一书，在1895年出版后，百年后的2013年，印度 Isha Books 重印。说明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所有抵制印茶、整顿边茶生产运销的举措停了下来，印茶趁虚而入，渐渐地充斥西藏市场，印茶曾一度长驱直入，曾卖到了打箭炉。

1908年，一个名叫布鲁克的英国人也走在了修整后的大相岭茶路上。

布鲁克一边行走，一边写日记，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布鲁克不仅记下了雅安印象，还记下了沿途的风物、人文以及道路情况。

半截“功德碑”，一段隐秘史。拂去历史的尘埃，在“功德碑”背后，隐藏着的一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茶叶战争”。

需要让冷落的高原血性
在石头上开出花朵的图案

雪融时刻，到处充满动词
有鸟衔来春天，有蜂蝶追逐
花骨朵刚冒头打个手势
总有那么几个爱美的女人
已经花团锦簇般灿烂

在掌心
浸骨的冰凉静静滑落
化作一滴滚烫的泪
久冻的高原恢复了元气
雪化了，值得怀念一下
雪融化了是春天，这是一个秘密

经过一冬深度休眠
相见，需要重新组织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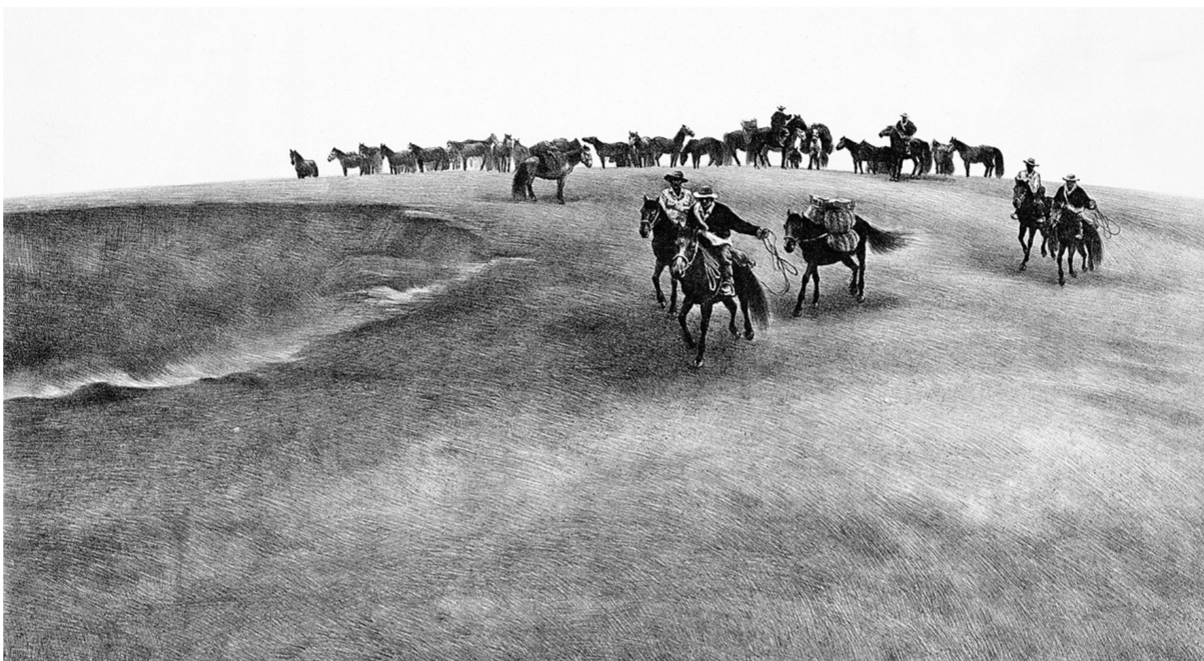
阳光把雪一点一点蚕食
渐渐剥离冰封的麻木
连枝头那最后一颗干果
也等来了久违的呼吸

炊烟在村庄的喉咙里
用正宗的藏语
告诉下一个村庄——雪化了

人物速写

灵魂不冻泉

◎刘忠俊



青海大草原。

川甘青藏毗邻地区孕育了长江、黄河两条中华母亲河，有着极度高寒缺氧的自然条件，历史上长期处于游牧部落状态。中古史记载，曾有牦牛羌、白狼羌、先零羌等活跃于此，故这片区域泛称为西羌之地。吐蕃勃兴时统一了该区域，称之为“多康”，元史译作“朵甘思”，意即：汇合的区域。这里汇合着黄河流域的安多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康巴地区。吐蕃衰落，这里成为各朝中央政府在经济上依靠茶马互市来维持商贾往来，在政治上依靠土司制度进行松散管理的地区。

清乾隆50年出版的《大清广舆图》上，这片区域还是雪山茫茫，河流村镇语焉不详。虽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也经由此域，但其地理人文少为外界所知，果洛等偏僻之地更是被清代民族沙文主义者称为“化外野番”。正是缺乏强大政权持续有效地统治，各个部落相互竞争、强者生存。也由此塑造出爱憎分明、豪放大气、精明能干的民族性格和英俊高大的外貌特征。特别是在康巴，涌现出格萨尔、波日·工布朗结、明正土司、德格土司等诸路豪强。1865年，瞻对入波日·工布朗结(布鲁曼)领导的农民起义已是强弩之末，面对川、藏和土多路大军压境仍不屈服，波日·工布朗结更是将招安的六品顶戴官服丢入滚滚雅砻江，转身回到波日寨誓死抵抗，兵败后燃寨自戕。康巴人直面于天地间，充分释放着自己的天性，丝毫没有折中与妥协的可能。

20世纪中叶，抗日战争促使中国政府拓展更大的战略纵深以及更多生存空间，于是“经略西部”成为共识。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许多科研工作者、文人和艺术家纷纷走进康巴地区，用画笔和摄影机来记录这片神秘地域。

画家吴作人、叶浅予、张大千，摄影家庄学本、孙明经等，这些以意气风发来经受荒原洗礼的艺术家们，留下了康巴最早的文化图像，也成为近代西藏题材美术的缘起。新中国成立后，内地画家董希文、黄胄、李焕民等进入了康巴，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成为第一次西藏题材美术创作高潮。80年代，大批内地美术家深入涉藏地区寻找灵感，搜集创作素材，表现青藏高原风土人情的绘画作品，正好给刚刚从“文革”中复苏的心灵以强烈的地震撼与审美荡涤，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第二次西藏题材美术的创作高潮，亦称“西藏热”。198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的吴长江先生第一次走进了青藏高原就受到这块高天厚土的洗礼和滋养，从此便将艺术人生锚定于此。

吴长江先生初次涉藏，是到甘南州碌曲县尔海公社写生，那时候他还是美院二年级学生。写生经历让他对牧民生活有着深刻感动。1981年，先生再赴甘南玛曲为毕业创作搜集素材。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石版画作品：《挤牛奶》《运牛粪》《扫雪》《青藏高原》《喂马》等。作品《青藏高原》以大面积有变化的灰色调同天空来对比，强调出高原的外轮廓；用点线结合来处理草地，显得精细又不会糊版。作品《喂马》采用中景构图，把天空乃至整个背景留白，画面淡雅纯净宛如一首清新的叙事诗。在这些早期高原题材的画作中，先生钟情于用黑白块组合出形式美，讲究石版印刷技巧，充分发挥石版颗粒细腻、变化丰富细腻的特点，创造出理性、单纯、静谧、深远的画面意境。1983年的速写作品《玉树青年》有着中世纪绘画般静穆感，从额头到下颌的那条边缘线轻重缓急都恰到好处，起伏跌宕充满活力，使观者深深着迷。

90年代，他又创作了石版画作品《远方来客》《阵雨》《高原之子》等。这一时期石版画作品也有着叙事性表达，是对藏族群众生活状态的礼赞。牧区生活蕴含着对人价值的思考与呼唤，使观众从中发现现代文明社会中逐渐消失的淳朴、坚毅与真实；更重要的是体会在高寒缺氧地严酷生存条件下，西藏人民在高原天地间拥有顽强生命力、拥有静穆单纯的生命力量以及智慧与达观！这不仅是描绘对象的日常生活，更是画家对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的认同和跟从。这些技法纯熟的石版作品带着新鲜高原气息，表现出旷远弘大的神韵，蕴含对自然淳朴美的追求。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了美术界强烈关注，先生成为“西藏热”代表画家，这些作品也被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阿斯莫林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日报社、江苏省美术馆、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等收藏。这一时期，他还撰写了《关于我的几张画》《高原的召唤》等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

此后，先生更加频繁地深入基层持续至今，人物水彩写生、人物速写渐渐成为他绘画的主要方式。写现场鲜活感让他觉得过瘾，更能直抒胸臆，更能体现出自己对西藏的理解。在长达四十年亲密交往里，先生的性格和情感慢慢具有了藏族牧民的坚韧和朴素，有着牦牛“狂风吹不倒、暴雪压不垮、严寒冻不死”的气势。

2021年，我陪吴长江先生到甘孜采风，去到离县城120公里、海拔4000米的达通玛牧区。这里没有旅店，我们只能借住在达通玛寄宿制学校会议室里。晚上，先生仅着一杯温水洗脸漱漱口后，我俩就在沙发垫上抵足而眠；半夜冷风嗖嗖地刮，我们盖了三床被子还觉得冷。早上天寒地冻，我们匆匆吃过学校食堂简餐，就开始忙活写生工作。

我们还来到拉日马藏寨，这是个偏远的牧区乡镇。风一起，整个镇子就黄沙滚滚，街头坐着几个康巴汉子在沙尘中静静地看我们，那种日光缝缝的黄灰色调里浮动黑色人影，极像是美国西部片。这里来往的人极少，所以镇上没有菜市场，一位内地来的女人经营着镇上唯一的餐馆。那几天我和先生都在这里用餐，简陋的木屋、一张木饭桌、昏暗的汽灯、围坐四人的穆滞目光都让我想起梵高那幅《吃土豆的人》。镇政府里有招待所，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地板和床都斜得厉害，还有八十年代铁质洗脸盆架，落满了尘埃，一种时光逝去的感受，极像是怀斯的水彩画。这个海拔4000米的乡镇经常停电，室内很冷我们就在阳光里写生。先生裹着绿色防风短大衣，脚蹬厚底户外鞋，在眼镜之上复架一副墨镜，这是他十多年都未改变写生必备。我们得赶在下午起风前完成写生，否则手脚就会冻僵。到了晚上也没有电和手机信号，我们只能早早休息，海拔太高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喂马。

雪融二月

高原笔记

◎谢臣仁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红色记忆

大渡河畔

◎贺先枣 邓明前 倪英

红军河东河西两路走

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兵分两路沿河北上，目标是夺取泸定铁索桥。1935年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总司令赶到安顺场，刘伯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现在我们只有四只小船，一次只能渡四五十人，来回一个钟头。照这样的方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据九军团来电称，薛岳部李耀珩第五十三师今天已经接近礼州，蒋介石不会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的。”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也说：“刚才我在镇上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秀才，朱大顺，他曾亲眼目睹了石达开的覆灭，他说‘此地不是停留之地，你们还是赶紧走’。石达开在大渡河边全军覆灭的阴影，仍然还笼罩着红军，红军前途未卜。”

毛泽东脸色严峻，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及在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看法也是一致。审时度势之后，毛泽东等做出了重要的抉择，并电告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刘、蔡)、左、刘，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右岸；林彪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左岸，均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准一军团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军委把“袭取泸定桥”的任务落实给林彪红一军团。

5月27日清晨，中央红军左右纵队分别从安顺场东西两岸溯河北进。中央红军右纵队(即东岸部队)行军序列为：红二团、红一师师部、红三团、红一师、军委干部团主力。兵力3000余人。军委干部团主力殿后，他们与红一师主力的行程差在三天以上。右纵队是由刘、聂首长亲率指挥。

前卫：红二团(团长龙振文，政治委员邓华)；

跟进：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

在红二团前路拦路的敌川军是三个团：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当日驻地：挖角坝；

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当日驻地：泸定县龙巴铺—海子山—石门坎—小寨子；

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主力，当日驻地：化林坪；

右纵队行军轨迹：5月27日清晨石棉桃子湾—野猪坪—熊河坝—七星坝—挖角坝—新桥—中山梁子—扁罗岗垭口—泸定县雨洒坪(5月28日)—两叉河—青岗湾—梨二坪—马鞍腰—得安老街—烂柴湾—小马场—箱子坪—碾梁包—桃子坪—加郡河口—新店子—风岗—加郡老街—刘河坝—石碑湾—安家湾—长河坝—瓦斯沟—石门坎—乌支棣—青岗坡—沈村堡子；兵分两路：红一师主力、红一师、红二团、军委干部团主力，沿慧峰河而上—龙巴堡—盐溪水—化林坪—飞越岭。另一路刘、聂首长率红三团，从沈村贾平过河，顺茶马古道—佛尔岩—木瓜沟—冷碛—大桥头—堰子坡—样杆石—甘露寺—挖角—大坝—金钗花—磨子沟—安乐园—柏秧林—泸定桥(5月29日夜)与红四团会合。次日，红三团沿路返回到龙巴堡，攻打化林坪守军。

左纵队(即河西岸红军主力部队)。

前卫：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

跟进：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委员邓飞)；

红四团、红一军团教导营、红六团和红二师师部，红一军团团部于27日先后从安顺场及附近地域出发；

红五军团，军委纵队于5月28日先后从安顺场及附近地域出发沿“开路先锋”红四团行军路线跟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随五军团跟进，与红四团相距100里，行程差一天。用毛主席话说：“便于了解敌情，指挥打仗”。

红三军团于5月28日到达安顺场，5月29日随左纵队路线跟进；

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五团于5月30日前后从安顺场或附近地域出发；

红九军团于5月30日前后从安顺场，或附近地域出发跟进，并指挥留在大渡河左岸殿后阻击川军的军委干部团三营。

红四团奔袭泸定桥这条小道上，有五个连的川军阻拦：分别是，在菩萨岗，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三营首脑部的两个连新兵守卫；在猛虎岗，有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二营陈月江部的两个连守卫；在湾东，有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特务营(改编的绿林袍哥组织)李国俊连守卫。